

卢润祥 选注

明人小品选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明人小品选

卢润祥 选注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 蔡忠民
封面设计 邵小明
封面题字 邵小明
技术设计 吴向喈

明人小品选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

印张9 插页1 字数175千

1986年4月第一版

1986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000册

书号：10374·156

定价：1.59元

隋 序

卢润祥同志编选的《明人小品选》杀青了。大约因为我除了整理研究元代杂剧散曲外，对古代散文也涉猎较多的缘故，他要我为此书写几句话，却之不恭，因此，我把想到的一些写在下面：

过去有人说，明人小品思想性不高，这样，在继承文化遗产上，它就似乎可能被拒之门外了。我认为这是十分可惜的。我觉得，明人小品中，愤世疾俗的作品是存在的；当然，思想性不那么强的作品也有。例如有些作品的思想看起来是消极的，对人生不那么热爱，但是，须知这是因为那些生活在当时社会的作者，为社会环境所逼迫，实在不能不发生那样的情感。我们应当同情他们，没有理由一定让他们积极入世，特别不能拿今人的思想去苛求古人。何况在艺术手法上，它还有许多方面可供今人的借鉴呢。本书在编选中，能注意从明人文集中选入一些至今尚未被人注意的作品，使沉埋的明珠得以重见天日，尽管这一工作尚属初步，但我认为还是值得称道的。

润祥编注此书，对于典实必考查交代清楚，有时为一个典实，往往反复翻阅原著，或与专家一起研究后再下笔。这种谨严的态度是很难得的。我想此书的出版，一定能在文化遗产继承问题上给我们一些启示。是为序。

隋树森

题 记

早在1930年代，晚明小品文曾在读书界流行过一时，在林语堂影响下，明人小品似乎成为遗世独立的性灵文学，无论日常生活或写诗文，要以非常闲适地抒个人之情为主。不久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炮火，把这种闲适的抒情气氛打垮了，从此，没有人再提起明人小品。

近来，忽然又有人在注意这种作品了。香港有一位陈少棠，写了一本《晚明小品论析》，要我写一个封面题签。我的一本《晚明二十家小品》，也已由上海书店重印出版，现在，卢润祥同志的《明人小品选》又已杀青，要我给他写一点序跋之类的话。这样一来，使我感到：好象我和晚明小品有密切的关系，也许现在的青年人，以为我也是在三十年代大力提倡明人小品的人。关于这一点，我觉得今天有必要说明白。

我在1936年编的《晚明二十家小品》，纯然是为了吃饭而投机编书，并不作为提倡晚明小品的文学事业，我在此书序文中早已交代过了。我认为对于一个作家，无论他的创作

方法，或他所选择来表现的题材内容，都不应该囿于一隅。人的社会生活往往是复杂的，有闲适的时候，也有激昂奋发之时；有抒写儿女私情的作品，也有发泄民族公愤的作品。只要看杜甫和辛弃疾两大诗人，他们的作品中有民族意识、有政治讽谕，但也有不少闲适的抒情韵语，这是每一个作家正常的创作方向。

最早宣传晚明小品文的是周作人，他在一次关于《新文学之流派》的演讲中，首先讲到以公安、竟陵两派文人为首的晚明作家，他们的创作倾向是反对前后七子的伪唐诗、反对唐顺之、茅坤的伪古文，反对当时达官贵人的馆阁文体，因而提出了抒发个人情感、纯任自然，不加刻划，不为载道之文，不用陈辞滥熟语等一系列针对当时文弊的主张。周作人以为：“五四”新文学运动的兴起，其基本精神与晚明的公安、竟陵派文学运动相似，因而，他的结论是：新文学运动的源流是上承晚明文风的。从这一角度来讲文学发展史，当然可备一说。但周作人把文学分为载道与言志两派，认为公安、竟陵文人是言志派，他们的对立面是载道派，这样就把作家的创作方法分为一对矛盾，抒情的不准载道，载道的不准抒情。后来，林语堂接过周作人的“火炬”，在上海大力提倡晚明小品文，积极宣扬闲适笔调，抒情文风，积极反对金刚怒目的革命杂文，义正辞严的载人民之道的文风。于是，林语堂所提倡的晚明小品，在当时的政治、社会形势下，只能代表资产阶级逃避现实的反动文风。

现在，读书界又出现了明人小品的选本，也看到有人著

文欣赏晚明小品，我利用为卢润祥同志《明人小品选》一书撰写题记的机会，把我对这一派文学的看法谈一谈。这些小品文大多本身并无问题，问题是如何对待、如何认识、如何继承和学习它们。今天的青年读者，不妨可以把它们看作为古典文学作品百花中的一朵，但不是唯一的一朵，也更不能说它是最好的一朵，应当了解它们之所以产生的积极意义，应当看到它们被林语堂之流利用之后所产生的消极作用。其实，不仅是晚明小品，我们对古典文学或外国文学的一切流派，都应该运用“一分为二”的辩证观点去了解和学习。这里，我只是就明人小品而言罢了。

施蛰存

自序

小品是散文的一体。它是包括随笔、笔记、杂感一类短小作品的通称。“小品”一词，始见于公元四世纪后，后秦僧人、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鸠摩罗什（系今新疆库车一带人）与弟子共译《摩诃般若波罗密经》（即《涅槃经》），把译作的全本即27卷本，称作《小品般若》，较略的译本，亦即节本的10卷本，称作《小品般若》。我国晋人的《世说新语》一书中也多见此词，如《文学》篇说：“有北来道人，好才理，与林公相遇，于瓦官寺讲小品。”可见，它原来本是个佛家经典语，后来借用来称某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的。

要谈论明代小品，首先得了解一下明代散文发展的概况。明初散文的代表作家是宋濂、刘基、高启、方孝孺等人，他们的作品文字凝重，不重纤丽，表现出对国事的关心、对人民的同情。自此三十多年后的永乐至天顺时期（1403—1464），由于统治者以八股文取士，因而兴起了由台阁重臣杨士奇等人的“台阁体”，作品内容多歌功颂德、粉饰太平，平庸空虚，成化至正德时期（1465—1521），统治者政权日趋不稳，

因有李东阳的“茶陵派”主张以先秦古文指导写作，加以以后的“前七子”（以李梦阳、何景明为首）提倡复古、学古，进一步给了“台阁体”以打击，但同时又造成了拟古摹古风气的盛行。至嘉靖、隆庆时期（1522—1572），又有“后七子”（以李攀龙、王世贞为首）起来与“前七子”呼应，但作品的形式主义仍然严重。以后，“唐宋派”的唐顺之、茅坤、归有光等，以唐宋散文为宗，主张“直抒胸臆，信手写出”，作品文字平易自然，成就十分突出。这一时期的徐渭、李贽是“公安派”的先声，特别是李贽，他的写“真心”、“真人”，反复古的主张影响更大，但真正给“前后七子”复古派以沉重打击的还是后来的“公安派”袁宏道等人；但由于他们的做法某些方面走过了头，一些作品流于轻率，经意不够，于是又有“竟陵派”钟惺、谭元春等人，企图用“幽深孤峭”的风格加以匡正。但又走上另一条形式主义之路。天启、崇祯时期（1621—1644）亦即明末的张岱博采各家之长，他的创作实践使明人的散文小品出现新的意境和风貌，对后世亦不无影响。

明代的小品则呈现出更为繁荣的局面，这主要是下列几个原因造成的：一，前代小品创作经验的影响；二，学术文化的进一步兴盛和市井平民对文学体裁多样化的要求；三，一般文人的提倡。他们不仅热衷于创作，还大规模搜集、整理、编辑笔记小品集，如冯梦龙的《古今谭概》就颇具影响。四，相对而言，明统治者的文网还比较松弛，特别于中叶之后；五，在明代散文写作的园地中，各种流派争鸣不息，延

续不断，促进了小品文学千姿百态、丰富多采风貌的出现。综观众多的小品创作，应该说确有不少作品是不乏积极意义的，有的作品还表达了一定的进步思想。

过去，有一种看法，即认为明人小品思想价值不高，多“吟风弄月”、“消极避世”之作，有人断言它仅能供有闲阶级的欣赏（见某文学史著作）；也有人用“无病呻吟”或“案头摆设”之类的字眼去评价它。这种意见可以上溯到三十年代，那时，周作人、林语堂等人提倡幽默、闲适的文风，大量印制明人小品，如袁宏道《广庄》和《瓶史》，前者是宣传庄子虚无思想，后者是谈论花瓶和插花艺术的，由此，它在客观上引导人们脱离当时现实斗争的同时，也给明人小品抹上了不少的尘埃，不少人因此对它产生了一些误会和曲解。其实只要有机会多接触一下这类作品，就不难发现前述观点，即那种完全否定明人小品的看法是片面的，也是不够公允的。即以袁宏道而言，他也有不少作品关心同情人民，表现出对黑暗的世俗社会和官场的不满。鲁迅就说过：他是“被撕破了衣裳”、“画歪了脸孔的”，指出他对当时进步的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曾经有过推崇，他曾批评朝廷不知起用他，“将令世道何所依赖”，说明袁宏道有着可贵的“关心世道”的一面（详鲁迅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招贴即扯》）。鲁迅还在《小品文的危机》一文中说：“虽然比较的颓放，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，其中有不平，有讽刺，有攻击，有破坏。”可见鲁迅对明人小品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。他的看法对我们认识和阅读这种作品无疑是会有很大帮助的。以下，笔者拟

就明人小品的思想价值和艺术表现等问题提出个人的几点浅见，以求专家、读者的匡正：

一、不少作品揭露了尖锐的社会矛盾，为我们留下了明代社会、政治、阶级、民生、人情、世风、文化等多方面可贵的历史资料。这些作品是了解明代社会生活的具体而又形象的丰富材料。宋懋澄是明代一位不被人注意的作家，他的《九禽集》曾被列为禁书，我从这书的善本中摘下两篇短文：

万历乙卯，山东大旱，百卉俱尽，有父以子爨之。官叩其状，子曰：“父不我食，且食于人。”官涕泣以之。（《爨父》）

道出临清南，执鞭人指东逵曰：“走此最饶人肉，不五十里，人羹一盞，小好二文。”（《人羹》）

这里所写的由于大旱父烹子而食的惨状，以至“人肉生意”是何等令人触目惊心。

袁宏道的《纪怪》一文，有“世如鬼道”之叹，通过“颠甚者”的话：“世间无可恋，除却死，更无乐事。”强烈地控诉了社会的罪恶，言语深刻尖锐。又袁中道的《〈苦海〉序》一文，一开头就是“人心如火，世缘如薪”八个字，文章把当时现实社会比作“苦海”，并由此萌发了对尘世的厌恶，从中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思想和士大夫的徬徨失途的感触。

二、不少作品反映了当时的民族斗争，表现了对清人入关后国亡家破的伤痛、江山易主的遗恨。其中以张岱的作品为代表，有的篇章读来字字是血，句句是泪，对故国乡土的感情表达得十分深沉。他的《〈陶庵梦忆〉自序》说：“陶庵（张岱之号——引者注）国破家亡，无所归止，披发入山，臧臧为野人。故旧见之，如毒药猛兽，愕窒不敢与接，作自挽诗，每欲引决，因《石匱书》未成，尚视息人世……。”反映了在异族统治下痛不欲生、悠悠忽忽、极度愤世、厌世的思想感情，是晚明小品中表现爱国思想的好作品。叶绍袁的《甲行日注》写清兵进占苏州后自己的流亡生活，日记的末尾说：

晚间，枯林戢响，斜月皎幽，东窗对影，一樽黯绝！颜子之乐自在箪瓢，予不堪忧者，家国殄瘁，岂能忘心。李陵所云：“胡笳互动，边声自起，独坐听之，不觉泪下。”

文章把家国沦亡的感受表达得十分真切。日记对当时群众抗清的意念也有描写，对清兵的罪恶，抗清志士的不屈，地方官吏的屈膝献媚都有细致的反映。

三、有的作品反映了对国事的关切，对贤明政治的迫切追求。宋濂的寓言《商於子耕》写商於子不用牛而以猪耕，不成；从而写出要求任用贤明者治国理政的道理。汤显祖的《与门人时君可》：“天下太平，必须不要钱，不惜死，生或不愧

此文官耶！”又《与天去上人》：“不乱财，手香；不淫色，体香；不诉讼，口香；不嫉害，心香。常奉四香戒，於世得安乐。”《答牛春字中丞》：“天下忘吾属易，吾属忘天下难也。”都写出了作者的政治抱负与理想。

四、有写对下层人民的同情的。归有光的《寒花葬志》写对婢女寒花的怀念，通过写她的装束打扮；削了荸荠却不许主人吃，吃饭时站在一旁的神态，写出了小婢女天真无邪和稚气。袁宏道的《山居斗鸡记》写“巨鸡”欺侮“美鸡”，一童子不平，“手缚巨鸡，容美鸡恣意数啖”，写出作者对弱者的同情，文章结尾用童子的话说：“较之读书带乌纱帽，与豪家横族共搏小民，不犹愈耶？”更是一针见血。

五、写官场黑暗、官吏腐败。薛瑄《猫说》中的“猫”，形体壮伟、爪牙锐利，但却贪食懒做，饥哺饱嬉，无所事事；文中的“鼠”，“觉其无他异”，“复出为暴如故”，讽刺官场弊病，淋漓尽致；张岱的《西湖香市》最后写昭庆寺失火，连年灾荒，饿死者“扛挽相属”，而大官们却还要打秋丰。结尾处把南宋无名氏的一首诗更动了几个字（即改成“山不青山楼不楼，西湖歌舞一时休，暖风吹得死人臭，还把杭州送汴州”），就把对荒淫误国的统治者的不满尖锐地反映了出来。

江盈科的《催科》、《任事》、《鼠技虎名》讽刺凡事推诿，不肖认真踏实办事的官员，他们窃居高位，装模作样，只管搜刮，不管百姓死活，以致“宗藩、官制、兵戎、财赋以及屯田、监法，率皆敝坏之极，收拾无策，整顿无绪。当

其事者，如坐敝船之中，时时虞溺，莫可如何”（《任事》）。再看袁宏道的《丘长孺》一函：“一日之间，百暖百寒，乍阴乍阳，人问恶趣，令一身尝尽矣。”《与何湘潭》一函：“吏情物态，日巧一日；文网机阱，日深一日；波光电影，日幻一日。”无怪他辞官后在《褻化南》一函中要这样写了：

败却铁网，打破铜枷，走出刀山剑树，跳入清凉佛土，快活不可言，不可言。投冠数日，愈觉无官之妙……

六、写当时世风日败，是非颠倒的：归有光的《甌喻》，过去也未为人注意，他写一“败甌”（指不小心摔破了盛物小盆）者的蛮横无理，他把路人某“持甌”者的甌，占为己有，反诬盆是他打碎的。“市人”则不分青红皂白，反而站在他的一边，从而抨击了当时社会是非曲直的颠倒。

七、更多作品描绘大自然山光水色，表现了对山河的热爱。袁宏道的《西湖》一文说：

从武林门而西，望保椒塔突兀层崖中，则已心飞湖上也……

读之令人心醉。王思任的《游慧锡两山记》写小情小景，清新活泼，酒香人影，如在眼前鼻间；张岱的《湖心亭看

雪》，写冒寒出游，写景十分传神，用“一痕”写长堤；“一点”写亭子；“一芥”写小舟；写人则用“两三粒”，衬托了“天与云，与山，与水，上下一白”的茫茫景象。

明人小品在文学技巧、艺术表现手法上有如下几个特点：

一、较之前代小品文，它更给人以“空灵”和清新平易、自然朴素，耳目一新的感觉。这是由于公安派袁宏道主张写“自己胸臆流出”的诗文、反对“前后七子”复古泥古派诗文所作努力的结果。于是，在文字尚“性灵”、尚“新奇”这一主张引导下，出现了不少“发人所不能发，句法、字法、调法，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”（袁宏道《答李之善》）的小品文，作品清新流利，给人以生动的感觉。袁宏道的《江长洲进之》（小简）一文，就有这样“令人夺魄”的句子：

他日虎丘一块石，太湖一勺水，传我两人佳话，
未可知也。

友爱的深情厚意表达得如此真挚、深沉和高尚，殊属非易。他的《王衷白》一函是写厌官的，有“舌头已入口内，眉毛亦阁眼上”句，语言确实新奇而不落套头。

二、更多文人在汲取民间口语上下功夫，因而使不少小品袭来有清新之感。如王思任的《游锡慧两山记》就有不少白话：

买泥人，买纸鸡，买木虎，买兰陵面具，买小

刀戟，以贻儿辈。

他的文字正是公安派“宁今宁俗”的体现。袁宏道的作品语言亦多不避俚俗（可参看本文前面引述的袁宏道的作品片断）。

三、较之前代，出现更多短制之作，充分显示了作者锤炼篇章的功力，从而使“小品”这一文学体裁的特点进一步得到发挥，大量的信简写作，更适合直抒胸臆，抒发独特的思想感情。笔者个人认为其中某些作品或许非实函，而是作者利用这一文学形式的写作。

汤显祖的《答陆学博》一函，全文只有十六个字：

文字谀死佞生，须昏夜为之，方命，奈何。

小简明确表示对奉承、谄媚的不满，认为这是见不得人的事。这层意思是用“须昏夜为之”五字表达出来的。文章如此短小，而表达的思想却如此博大。

明人唐显悦的《文娱序》引郑超宗的话，总结了小品短制文体的特点：

小品一派，盛于昭代，幅短而神遥，墨希而旨永……寒琼独杂，众卉避色……。

四、继承前代作品的创作经验，在运用细节描写中亦有突